



数字游民嵌入乡村的逻辑、困境和应对策略

——基于浙江省丽水市 Cohere 青年社区的实证研究

吴慧慧

(中共遂昌县委党校, 浙江丽水 323300)

摘要: 数字游民入乡对推进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布尔迪厄实践理论中“场域—资本—惯习”的分析框架,以丽水市 Cohere 青年社区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数字游民嵌入乡村机制。研究发现:在城乡场域转化过程中,数字游民需要通过对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以及符号资本的有机转化和持续积累以实现惯习重塑,具体包括以文化资本转化为基础,促进城乡发展经验融合;以社会资本转化为纽带,推进与乡村社会互动;以经济资本转化为核心,动员乡村内外资源;以符号资本转化为助力,建构“知识型”能人形象。然而,在此过程中,数字游民也面临乡土规则难以适应、制度性支持不足等现实困境。未来应进一步发挥地方政府引导作用,通过打造互动场域、构建关系网络、集聚内外部资源以及提升身份权威等方式,持续推进数字游民和乡村振兴的良性互促。

关键词: 数字游民; 乡村; Cohere 青年社区; 场域理论; 资本; 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 F49; F320.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26)04-0218-10

The logic, dilemma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digital nomads embedded in rural area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based on the Cohere Youth Community in Lishui, Zhejiang province

WU Huihui

(Party School of Suichang County Committee of CPC, Lishui 323300, China)

Abstract: The rural embeddedness of digital nomads holds significant practical value for promot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Drawing on Bourdieu's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field-capital-habitus",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rural embedding mechanism of digital nomads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the Cohere Youth Community in Lishui.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during the urban-rural field transformation, digital nomads achieve habitus reshaping through the organic conversion and continuous accumulation of four forms of capital: economic, cultural, social, and symbolic. Specifically, this process manifests as: cultural capital conversion facilitating urban-rural experience integration; social capital conversion strengthening local interactions; economic capital conversion mobiliz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ources; symbolic capital conversion constructing an "intellectual-type" elite image. However, challenges such as difficulties in adapting to rural norms and insufficient institutional support persist. In the future, the local government should further play a guiding role in creating interactive fields, building relational networks, aggregating resources, and enhancing identity authority to foster mutually beneficial engagement between digital nomads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digital nomad; rural areas; Cohere Youth Community; field theory; capital; rural revitalization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城乡融合发展,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1]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农村流向城镇的流动人口为3.31亿人,比2010年提高3.85%^[2]。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第二季度,全国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总量为19139万人,同比增长0.7%^[3]。在全国城镇化率提高的同时,乡村“空心化”问题逐步凸显。15~39岁的年轻人常住在乡村的比例低于30%,乡村青年人尤其匮乏^[4]。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城乡“推力—拉力”双重因素作用下,青年返乡创业呈现持续增长态势。统计数据显示,当前全国各类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超过1200万人^[5],2025年这一群体规模或将超过1500万人^[6]。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指出,要鼓励和引导青年入乡发展和就业创业,持续壮大乡村人才队伍^[7]。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数字游民作为青年返乡实践的新型主体,日益成为学界和政界研究的焦点。“数字游民”概念于1997年提出,指的是“利用互联网进行在线工作,借助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生活成本差异从而在工作与旅游之间自由切换的人”^[8]。近年来,伴随着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媒介技术的进步,加之跨地区流动的便利性增加,数字游民现象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快速扩张趋势。2024年,全球数字游民数量已达到4000万人^[9],且保持持续增长态势,预计到2035年可能突破10亿人^[10]。在中国语境下,这一现象伴随着“边工作边旅游”“在绿水青山间办公”等颇具浪漫色彩的媒介叙事在社交平台 and 大众媒体广泛传播,引发年轻人的热烈追捧,逐步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数字游民热潮。

目前,中外学界对数字游民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主要集中在身份解读、生成逻辑、群体功能以及发展策略等方面。西方研究显示,对于数字游民来说,“地理套利”即在低成本地区生活但赚取大城市收入是其基本的流动逻辑^[11]。在中国乡村振兴和数字乡村建设的政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数字游民选择来到乡村并建立工作室,成为“数字乡民”。数字游民不仅为乡村带来了新的发展活力,还推动了城乡之间资源要素双向流动,从而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12]。因此,探究数字游民乡村嵌入问题有重要现实意义。数字游民的乡村嵌入主要包括主体嵌入、关系嵌入和技术嵌入三个层

面^[13]。一是主体嵌入,主要体现在以游民社区为接口衍生的青年创业业态。例如李立杰等^[14]以安吉“DNA数字游民公社”为研究对象,认为游民公社为溪龙村吸引了职业类型丰富的数字产业人才,但他们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的实践参与度不足。二是关系嵌入,主要关注数字游民群体在社区内部以及同当地村民在长期互动中产生的情感联结。例如曾昕等^[15]认为数字游民需要社区,也需要“附近”:在地关系的嵌入和生长,不仅帮助青年重新理解自己和周边、社会的关系,并且为青年直接参加乡村发展提供契机,并发展出一种新型的社会实践形态。三是技术嵌入,主要体现在创意赋能下的乡村改造项目。技术嵌入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其本质在于利用数字化手段将城市需求和乡村场景有效链接,并衍生出打卡经济、夜空经济、亲子经济等多种新型消费业态。

目前关于数字游民的学术研究较少有扎实、成体系的田野调查和案例分析,且观察对象相对局限,以安吉“DN系”数字游民社区为主^[16]。在已有的数字游民案例分析中,大多关注现存的实践样态,理论建构相对薄弱,且对数字游民乡村嵌入的制度性障碍及其破解路径关注不足。鉴于此,本文聚焦新萌发青年社区浙江省丽水市 Cohere 青年社区的微观样本,运用布尔迪厄场域理论的“场域—资本—惯习”分析框架,通过田野观察、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深入探究数字游民嵌入乡村的实况,以期为优化数字游民参与乡村振兴的制度设计提供新的经验参照。

一、场域理论视角下的数字游民

在初入乡村之际,习惯在城市工作、生活的数字游民,往往面临着场域转化带来的“阵痛”。这种“阵痛”在新数字游民群体和新游民公社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提出的“场域—资本—惯习”的理论框架有助于分析这一过程。“场域”是存在于空间之中与物体之间的网络,其存在和维系依赖于各类资本的差异化配置^[17]。“资本”是场域中各类主体拥有的资源与权力的外显,是场域转换的推动力。“资本”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即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符号(象征)资本。“惯习”建构自社会结构之中,又与个体的认知、经验与所处环境密切关联,是“把外在世界内化并使内在世界外化的场所”^[18]。“惯习”对个体行为具有持续的引导和规范作用,是场域转换中个体行为改变的原动力^[19]。当个体所处的社会场域发生变化的时候,个体会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同周围环境的互动实现动态适应和惯习重

塑,这就是惯习的自适应性。由此可见,场域理论为研究场域内诸多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演变机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工具。将数字游民行为放在场域理论中加以分析,有助于超越对数字游民的个体探究,转而探究外部结构变化(场域转换)与个体实践(惯习重塑)之间的有机互动,为进一步理解数字游民的乡村嵌入过程提供新视角。

在乡村空间重构的进程中,多元主体和资本的快速涌入促使乡村场域经历了从传统“封闭空间”向现代“开放空间”,再到数字时代的“流动空间”的转变^[20]。作为新型入乡主体,数字游民在数字乡村场域中发挥着双重作用:其空间流动不仅实现个体的“身体入场”,更建构起城乡场域间的资本流动通道。实证研究表明,数字游民由城入乡的场域转换往往不如想象中“丝滑”,经常面临资本转化困境和惯习错配问题^[21]。数字游民来自城市,长期的城市生活

塑造了其工作、生活和认知惯习。然而在进入乡村场域时,许多游民的固有惯习往往同乡村社会结构存在错配现象。要实现数字游民对乡村振兴的有效赋能,必须实现“场域—资本—惯习”的动态适配,即在场域变化中实现资本有效转化和惯习重塑。新入乡群体需要嵌入乡村诸多子场域,包括文化场域、政治场域、社会场域等^[22]。不同场域展现了不同类型的资本转化需求。在经济资本维度,需要通过调动内外部资源以调配生产要素;在文化资本维度,需要通过整合以往经验和乡土文化以适应乡村社会;在社会资本维度,需要通过同社区内其他游民、政府、村民等主体的在地互动以嵌入社交网络;在符号资本维度,需要依靠其他资本转化以及权威背书等方式以塑造“能人”形象。基于此,本文构建了数字游民在由城入乡的场域转化中资本转化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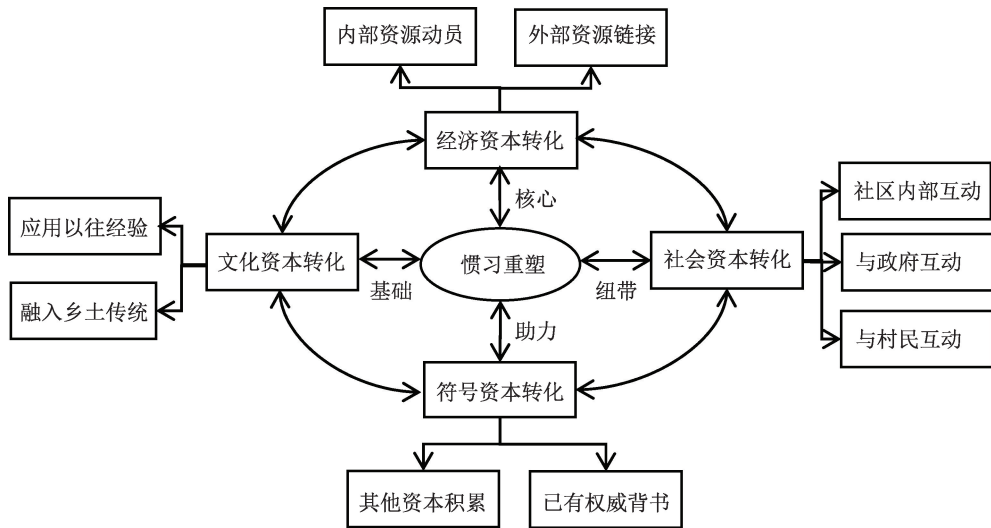


图1 本文的分析框架

二、Cohere 青年社区田野概况和研究方法

(一) 田野概况

作为促进青年发展的政策创新先行者,浙江省于2018年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青年发展型省份的目标,并于2022年将“加快建设青年发展型省份”写入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报告,从而将青年发展从实践探索上升至省级战略层面。政策实施方面,浙江建构了“政策供给—平台建设—项目孵化”的立体化支持体系:一方面,通过“青创十条”等专项政策强化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创新推出“青创乡村”“青农飞地”等青年入乡特色培养模式,三年间累计扶持青年创新产业项目5000余个,建成青创阵地1000余家^[23]。这种系统性的青年支持体系为数字游民生

态培育提供了独特的政策场域,推动安吉、桐乡等多个数字游民基地迅速发展,使浙江成为吸引全国乃至国际数字游民的重要区域。

作为浙江省西南部的重要生态屏障,丽水市虽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丰富的文旅资源,却受制于山区地理条件、交通基础设施薄弱以及产业结构单一等因素制约,长期以来人口外流趋势明显,农村面临人口空心化、资产闲置化、产业滞后化等突出问题。因此,破解青年回流难题与激发乡村活力是丽水发展的关键命题之一。

近两年来,丽水市创新性地将数字游民群体纳入乡村振兴战略体系,充分发挥“生态资源禀赋+闲置资源存量”的优势,系统地构建数字游民引育机制。2024年,丽水发布的“数字游民居居共创丽水

计划”具有里程碑式意义。首批推出莲都古堰画乡、遂昌天工之城、缙云新西坑等6个青年共居共创基地,并通过举办全国社区运营邀请赛的方式签约专业运营团队,标志“政企社”协同模式的初步成型。同时,丽水还发布了全国首个设区市全域数字游民专属政策《丽水市支持数字游民发展八条举措》,涵盖游民引进、基地(社区)运营、创业扶持等全链条支持措施。2025年,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引进数字游民1000人次以上”的量化目标,进一步彰显了政府支持数字游民发展的战略决心。

作为政府主导建设的标杆性数字游民社区,S县H乡的天工之城 Cohere 青年社区(以下简称 Cohere 社区)呈现出“流量的田野”这一典型特征^[24]。该社区由人才公寓改造及村居租赁整合而成,现有4幢楼、57间房,可容纳约80人,功能分区涵盖办公、住宿、娱乐等模块。社区现处于常态化运营中,截至2025年3月已累计吸纳107位游民入住,长期保持80%以上的入住率,其“国企(LS集团)持有产权+市场主体(TC公司)专业运营”的运维模式已基本成型。本文选择 Cohere 社区作为典型案例分析对象,主要原因有三:首先,相较于安吉“DN系”数字游民社区,Cohere 社区较低的入住门槛吸引了大量初涉数字游牧生活的群体,为观察数字游民乡村适应初期的行为特征提供了理想样本。其次,该社区本质上属于政策设计的产物,其建设目标具有双重性——既作为人才吸引平台,更承担着孵化青年创业项目的战略功能,充分体现了数字游民赋能乡村振兴的作用路径。最

为重要的是,S县政府的各个部门持续参与社区建设与发展,这种“政府—市场—社会”三维互动模式为探究数字游民社区发展中的政府角色提供了鲜活样本。

(二)研究方法

笔者于2024年12月至2025年4月期间多次前往 Cohere 社区开展实地调研,主要采取田野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两种质性研究方法。一是田野观察,即进入 Cohere 社区,同社区内数字游民共同工作、生活、娱乐,以内部人的视角更直观地观察数字游民的乡村实践过程;二是半结构式访谈,共选择12位(曾)入住 Cohere 社区1月以上的数字游民进行深度访谈,其中男性4名、女性8名,分别用序号 DN1—DN12 表示,访谈对象信息详见表1。10名受访对象成为数字游民时间为1年及以下,属于新数字游民群体;年龄处于20~30岁,平均年龄为27岁,均属于青年群体;学历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有11人(其中研究生4人),不乏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名校毕业生,学历层次相对较高;大部分受访者从事互联网类、创意类工作,契合数字游民职业画像。对于部分已经离开社区的访谈对象,采用在线访谈的形式。访谈主要围绕游民身份认知、社区体验、在地互动等方面展开,以便总结数字游民在乡村嵌入中的资本主要转化路径以及现实困境。与此同时,围绕 Cohere 社区建设背景、规划、运营以及落地过程等方面,还访谈了社区运营商(用序号 CO1 表示)、政府工作人员(用序号 GV1、GV2 表示)以及当地村民(用序号 CM1、CM2 表示)等其他相关主体。

表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序号	编码	学历	年龄/岁	当前(曾)从事工作	成为数字游民时间	之前所在城市
1	DN1	本科	29	游戏策划	1年	上海
2	DN2	研究生	30	游戏设计	2个月	上海、珠海
3	DN3	本科	28	创意视频创作	1年	杭州
4	DN4	本科	30	程序员	1年	上海
5	DN5	本科	28	平面设计	2年	杭州
6	DN6	研究生	30	留学咨询	5年	各国旅居
7	DN7	高中	21	抖音运营	1个月	郑州
8	DN8	本科	23	客户管理	1年	上海
9	DN9	本科	24	新媒体运营	4年	北京
10	DN10	研究生	28	管理培训生	5个月	上海
11	DN11	研究生	27	活动运营	1年	长春
12	DN12	本科	29	货运代理	1年	上海
13	CO1			社区主理人		
14	GV1			政府人员		
15	GV2			政府人员		
16	CM1			小吃店经营者		
17	CM2			社区清洁人员		

三、数字游民嵌入乡村的实践困境

研究发现,Coher社区作为新兴数字游民聚集地,尽管运营时间较短,但在入住率、社区活动、政府互动等方面均表现良好。数字游民在嵌入乡村的过程中依赖各类实践载体以实现资本转化和惯习重塑,对地方发展的贡献逐渐从“身体入场”衍生的房屋租住和在地消费向“资本流动”衍生的创意赋能、在地改造等多场景转变。然而,现阶段Coher社区更多彰显了物理意义上的人口聚集,游民的在地联结属性不强,面临着文化隔阂、身份认同等问题。

(一)文化资本转化:现代性思维与乡土性思维的交织碰撞

相较于传统“城归”群体,数字游民呈现出显著的职业特征差异。数字游民大多从事创意性和趣味性强的工作,职业包括短视频博主、自由撰稿人、平面设计师、游戏开发者等,因而被称为“知识型游民(knowmad)”“创意一族”。源于其多元化的生活经历、职业特性和兴趣爱好,数字游民所具有的现代性思维模式使其在乡村发展实践中展现出独特的文化资本优势。在Coher社区中,“乡创考察团”项目充分体现了数字游民文化资本的转化路径。2025年3月,在团县委的组织下,15名数字游民组成“乡创考察团”,通过实地走访H乡、X乡和D镇,以及参与“政府—数字游民”双向赋能座谈会等方式开展了文化资本转化尝试:a)物质文化层面,考察传统村落保护现状与空间再生产状况;b)制度文化层面,分析非遗版画传承的地方性知识建构情况;c)技术文化层面,探究数字茶产业的技术嵌入机制。例如,有参与“乡创考察团”的数字游民结合切身感受,提出打造原生态文旅项目的建议:

今天看到的村落实际上算是未开发的,它不是一个成熟的商业化产品。让平时审美疲劳的一个人突然像看到了一片净土一样,我就很想去摸一摸那片土墙,看一看溪水,去感受溪水在手上流淌的感觉。我觉得这里很适合做一些心灵疗愈、林中树屋的项目。(访谈资料DN9)

数字游民与乡土社会的文化互动呈现出独特的“低冲突—弱联结”特征。尽管城市文明塑造的现代化认知(如效率导向、契约精神)与传统乡土文化(如人情社会、差序格局)存在不可避免的潜在张力^[25],但本研究发现,Coher社区的数字游民与H乡村民之间的文化摩擦呈现出非显著性特征。这一现象源于三种原因。一是空间隔离性:数字游民的日常

活动高度集中于社区内部,超过80%的日常互动发生在同质群体内部;二是生产脱嵌性:数字游民的在地实践并未嵌入乡村社会生产体系,因此其与地方社会的情感联结处于较弱状态;三是需求差异性:相较于返乡创业者、乡村职业经理人、大学生村官等需深度嵌入地方治理的群体,数字游民对村民认同的需求强度较低。例如,访谈中有数字游民提及社区内部互动和同村民互动的深度差异问题:

我从事全面性教育相关工作。我觉得性教育没什么好羞耻的,是关于爱和生命的教育。我可以在社区中同朋友们毫无顾忌地探讨性相关的话题,也在社区发起了一个关于性教育的活动。我不会和当地村民探讨这些话题,但是我也并不觉得和他们有很深的文化隔阂,因为交往深度不同。(访谈资料DN7)

(二)社会资本转化:社区内聚化特征与外拓化局限

在文化资本积累过程中,数字游民也逐渐与在地主体(村民、乡政府等)产生互动,并构筑起社会资本转化的基础。数字游民的社会交往以社区为界,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特征:在社区内部主要基于共同兴趣、以社区活动为纽带形成“趣缘型”联结,而与当地村民的互动则展现出显著的“事缘型”特征,形成一种“即插即用”“即走即拔”的“U盘式”情感联结模式^[26]。“阿平小吃店改造”项目作为社会资本转化的典型案例,集中体现了数字游民与村民端互动的正向效果,并呈现了“情感联结建立—调试创新—价值共创”的阶段性特征。在情感联结建立阶段,阿平小吃店凭借地道的菜品口味与亲切的服务态度,自然形成了“游民食堂”的社区认同。这种基于饮食文化的非正式互动,构筑了社会资本积累的初始基础。在调试创新阶段,面对小店原有的“看食材下单”模式与青年偏好的“菜单点菜”模式的差异,数字游民主动发起适应性改造,不仅为店铺设计标准菜单,还通过软装升级让传统农村小炒店“潮了起来”,提升了消费体验。参与此次改造项目的平面设计师DN2在访谈中分享了这一经历:

店里最开始啥也没有。然后我觉得这绿色格子挺不错的,就从中提取了一些元素做了菜单,显得吸引人一点。我又觉得光有个菜单可能不够,就点了几个菜拍了照片做素材,还做了海报设计图。后来我有事离开了社区,但有小伙伴继续跟进该项目。(访谈资料DN2)

在价值共创阶段,数字游民借助大众点评线上

平台,通过实地打卡、影像记录与评论转发等方式推动该店铺变成地方网红打卡点,显著提升了小店的社会关注度与经济效益,从而形成了“新游民—老村民”协作共赢的示范案例。阿平小吃店的经营者潘阿姨(CM1)对此深有感触:

我的孩子都在外地工作,平时乡里见不到几个年轻人。现在,身边年轻人一下子变多了。和年轻人们待在一起,我感觉自己也变得年轻了。他们来了,我的生意好了不少。还有人看了网上推荐特意开了半小时车来我这打卡。(访谈资料 CM1)

青年人才在参与乡村振兴过程中,常遇到身份认同困境,明确以何种身份融入和参与乡村建设是其发挥作用的关键^[27]。身份认同问题在初入乡村场域的数字游民中尤为凸显。Cohere 社区所在地政府主导的“乡创考察团”“野菜 Pizza”等系列活动的开展,为数字游民群体与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社区运营主体之间搭建了制度化的交流渠道,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正式场域内的社交联结。然而,数字游民与本地村民、企业之间的互动密度仍显不足,尚未形成常态化的社会资本积累机制。基于高流动的基本属性,数字游民群体内部呈现出显著的“小团体化”聚合倾向,导致其身份认知普遍徘徊于“临时性地者”与“系统性参与者”之间。这一特征在其他数字游民社区的经验研究材料中亦有充分印证^[28],反映出游民群体社会网络的内聚性特征与外扩性局限。其深层矛盾在于流动性生活方式与乡村振兴所需的持续投入之间的张力,正如多位受访者强调的“离开的必然性”所暗示的时空局限:

我在 Cohere 交到了几个知心朋友。但是现在和我关系最好的几个朋友走了,最近社区都是一些新面孔,所以我也在考虑离开。(访谈资料 DN1)

除了社区之外,我去别的地方不多,除了潘阿姨之外和当地人交流也不多。反正我早晚是要离开的,和当地人建立太深的感情也没有必要。社区附近交通也不便,离社区大概十几分钟路程的仙侠湖水利公园有共享电瓶车,但是要 38 块一个小时,而安吉那边只要几块钱。(访谈资料 DN11)

(三)经济资本转化:内部资源动员与外部资源链接不足

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在数字游民乡村嵌入过程中呈现显著的协同效应,两者的良性互动构成了外

来群体在地发展的核心机制。例如在安吉“DNA 数字游民公社”中,数字游民通过举办生活艺术节、茶饮空间改造、茶产品包装升级、茶文化推广等方式实现了经济资本有效转化,有效推动了安吉白茶产业的提档升级^[29]。然而,出于“成本—收益—风险”的理性考虑,初创社区中数字游民的经济资本转化呈现出轻量化特性,即以寻求合作替代独立引进项目。同安吉“全球合伙人”项目相似的是,Cohere 社区的“项目合伙人”充分体现了经济资本转化中的两大核心路径,即内部资源动员与外部资源链接。毗邻 Cohere 社区的 Marvelous 水上运动公园主营潜水、桨板、皮划艇等水上休闲运动服务,以湖潜项目为特色。一位从事美人鱼教练工作的数字游民以项目合伙人的身份达成了与 Marvelous 的长期合作。在内部资源动员方面,数字游民以专业技能填补了技术岗位的缺口,并实现了同在地企业的合作;在外部资源链接方面,依托数字游民的跨区域社会资本,构建“线上引流+线下体验”的营销新渠道,有效增加了该公园的省外客流。经手该项目的 S 县政府工作人员进一步谈论了数字游民经济资本转化的可能性:

……她在北京有自己的工作室,自己也在寻找自然条件好、配套设施齐全但相对比较小众、人不多的潜水场地。她看到这个水上运动公园就觉得非常合适,一拍即合,成了项目合伙人。我觉得许多数字游民的工作都同当地发展有链接可能性。例如有数字游民就向当地数字企业“此声文化”递简历,想做音频设计方面的兼职工作。(访谈资料 GV1)

研究显示,数字游民在经济资本转化过程中面临的核心制约在于资源动员的双重结构性困境,即内生性约束和外源性障碍。内生性约束集中体现在项目适配缺口和制度性延迟两大方面。数字游民主要从事互联网及文化创意类工作,其工作形态以项目制为主,通常实行“一项目一结算”。然而,在 H 乡乃至 S 县范围内,可供数字游民承接或参与的项目供给明显不足。即使在政府主导项目中,由于权责划分模糊、流程冗余,资金到位周期长。在社区外部,数字游民同样面临城市资源和乡村场域难以适配的问题,城市投资者对乡村项目的风险评估普遍较高。双重结构性困境催生了典型的“双没”(没项目、没资金)现象:

我主要做 VR(虚拟现实)游戏。VR 在文旅方面有很多应用。例如现今很多博物馆或者景点里都有 VR 体验馆。你戴上 VR 头盔之

后,可以帮你还原这个地方原来的场景或是过去发生的某个著名事件。我在嘉兴南湖和北京人民代表大会纪念馆都看到过。我觉得S县也可以做,但暂时没看到有类似项目。(访谈资料DN1)

做潘阿姨那个项目的时候,我们一直想把门头视觉效果落地。做灯牌估计需要三四千块钱,但没有可用的资金来源。我们也在想办法争取一些外部的投资,但收效甚微。社区公共空间改造也有类似问题。(访谈资料DN5)

(四)符号资本转化:身份认同明显不足

在入乡青年中,数字游民属于典型的“外来的陌生人”,因缺乏正式身份导致无法形成本地权威和号召力。该群体主要通过两条路径实现符号资本转化:一是其他资本积累,即通过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不断积累和有效转化,逐步提升在乡村场域中的社会声望;二是已有权威背书,即依托政府机构、地方精英等既有权力主体的制度化或非制度化背书。其中,知识作为数字游民建构“能人”形象、积累象征权力的核心要素,在“数字游民学院”等政府主导的实践平台中得到显著体现。以Cohere社区的AI(人工智能)技术专家Z为例,其兼具AI艺术理论研究与智能语音交互、游戏行业AI应用的实践经验。2025年2月,Z受邀开设的“AI运用实战班”吸引了当地三十余位青年参加,有效促进了其符号资本积累。有游民在访谈中谈到对AI课堂的感受:

我是学电子信息技术的,之前一直在杭州做程序员。我觉得这个AI课堂挺不错的,能让喜欢AI的朋友们在一起交流学习。也有一些在H乡企业工作的小伙伴过来。大家都觉得Z很厉害,属于技术大咖。(访谈资料DN4)

对于返乡创业青年,村民对他们往往带有“城市混不下去才来乡村”的不思进取、能力不够、没本事等刻板印象,外部认同明显不足。负面舆论常常对返乡青年的创业积极性和自信心造成极大打击^[30]。数字游民群体则面临更为复杂的认同挑战:不仅承受着村民对其职业选择的“不理解”与“不认可”,还需应对地方社会对其表现出的过度关注。访谈中,数字游民普遍表示存在“被凝视”“被观看”的主观体验,这反映了其在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特殊位置。此外,地方政府对数字游民在乡村振兴中的功能定位一直存在争议,部分人员表现出明显的怀疑态度。这种制度性认同缺失,客观上阻碍了数字游民符号

资本的有效积累。

我是个i人,我记得社区里每个和我主动打招呼的人。有时候出去的时候会觉得有人在看我,但他们不会和我主动说话。最近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是政府人员来社区参观考察,这让我觉得有点不适。(访谈资料DN8)

我想做一个这种类似于乡村探访或乡村疗愈的媒体号。H乡有很多好看出片的民宿,淡季时候他的房间空在那边,是零收入的。他让我住一周,然后我出几条视频去宣传,再留一些素材给民宿。要是有人看了我的视频过来,我再和民宿谈分成的问题。我会做视频、剪辑,也会做新媒体运营。我之前和一家民宿谈过,基本达成了合作意向。但是更多民宿觉得我是骗人的,要是政府背书或是正式项目支持就好了。(访谈资料DN9)

四、数字游民嵌入乡村的策略

相较于西方,中国语境下的数字游民群体体现出更为强大的内驱力,能自主去寻求、整合和调配城乡间流动的基础设施资源^[31]。以惯习重塑为动力,该群体在乡村场域的嵌入过程呈现出高度的主体性,发展出了多元化的实践策略。通过系统性行动,数字游民逐渐构筑起以文化资本为基础、以社会资本为纽带、以经济资本为核心、以符号资本为助力的复合型资本转化网络。其在地实践实现了自身资本积累,也在潜移默化中重塑乡村场域。这一转化过程的顺利实现,既需要充分发挥数字游民的数字技能禀赋、跨域资源网络与创新思维优势,也有赖于地方政府、社区运营商、本土企业和村民等多元主体的协作,从而将数字游民的“流动智慧”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一)以文化资本积累为基础:打造互动场域

基于数字游民和乡土空间隔离性、生产脱嵌性,两者的文化互动呈现出与其他外来群体不同的“低冲突—弱联结”特征。然而要实现数字游民的深度嵌入,乃至成为“数字慢游民”“数字乡民”,则必然要打破社区和乡村的界限,推进数字游民和乡土社会的相互了解。为促进文化资本积累,需通过活动策划、空间拓展、成果植入等方式构建“数字游民—地方社会”的互动场域,以加强数字游民同乡村场域的日常互动和情感联结。

一是开发特色活动。《2024年全景式数字游民洞察报告》^[32]中的游民画像显示,1/3的数字游民都

有运动习惯,户外运动中徒步登山(29%)、骑行(20%)和水上运动(13%)比较受欢迎。在 Cohere 社区游民访谈中,参加龙游“走走节”是数字游民们提及最多、印象最深的活动。因此,建议乡村结合地方生态文化资源,开发和组织低参与成本的文化类、体育类活动。例如 H 乡在端午节组织的包长粽活动,既促进游民同地方社会的文化认知,又增强情感联结。二是构建空间载体。建议设立“文化共享空间”作为常态化交流平台,通过技能互换(例如数字技能培训与农事知识传授)实现文化资本的“隐性交流”。这种双向互动不仅使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逐步渗透到地方文化生态中,也有助于乡土智慧反哺其创作理念,形成双向的文化资本动态更新机制。三是固化文化成果。需重视文化成果的物理载体应用,例如将数字游民参与设计的版画作品作为乡村公共空间的艺术装置,植入街道、社区及地方民宿等场所,实现文化资本的显性沉淀。互动场域的建构目的是解决不同主体在文化认知和思维方式方面的差异,通过系统性设计促进相互理解,加速文化资本积累进程。

(二)以社会资本积累为纽带:建构关系网络

数字游民社会资本转化的核心,在于构建动态演化的多元主体关系网络。这一网络既能为社会资本的跨群体流动提供通道,又能通过信任机制与合作实践激活经济资本、符号资本转化,充分体现社会资本的纽带作用。当然,社区网络核心并非一成不变。以安吉“DNA 数字游民社区”为例,其初期由社区初创团队和屯社精英主导,后期则伴随社区规模扩大和持续宣传效应,转变为政府利用行政资源引领社区发展^[33]。

一是强化政府引导。政府应充分正视数字游民的主体价值,通过组织社群活动、完善便民设施、定期开展座谈等制度化路径建立与数字游民群体的双向信任。湖州“游民会客厅”平台成功引进 50 余个新业态项目^[34]的实践表明,双向互动机制既能吸纳创新建议,又有助于传递政策导向。与此同时,政府需恪守“适度介入”原则,避免对数字游民群体造成过度干扰,尤其应尊重社区居住空间与办公空间的自主性边界。二是构建“线上+线下”互动载体。在创业领域,可设置季度联席会以同步政策信息、商议项目合作;在生活方面,则可以通过微信群及时沟通集会、用餐、路线等信息,培育日常信任资本。三是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以 Cohere 社区为例,初期可由政府主导建构网络,成熟期则过渡到以社区运营团

队与游民先锋自治、政府后方支持保障的模式,避免角色固化导致的网络僵化,保持系统活力。

厉以宁教授指出:“在推进效率增长方面,道德的作用超越市场、政府,在非交易性质的经济活动中更是如此。”^[35]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培养数字游民,尤其是数字游民先锋“乡村振兴参与者”的身份认同至关重要。只有通过价值观重塑,激发数字游民热爱乡村、改造乡村、提升乡村的使命感,才能实现社会资本向乡村振兴动力的长效转化。这一转化过程遵循“制度设计—信任建构—价值认同”的递进逻辑,充分体现了中国语境下乡土社会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创造性融合。

(三)以经济资本积累为核心:集聚内外部资源

伴随社会资本的不断积累,数字游民对乡村内部资源的动员和外部资源的链接能力逐渐增强。数字游民作为城乡链接的桥梁,在入场乡村的过程中加快了城市资源和数字技术下沉乡村,为乡村振兴与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动力。基于中国乡村的多样性特征,经济资本转化策略也需因地制宜。

实现经济资本转化的核心在于以机制创新匹配数字游民技能和乡村本地资源。一是精准设计项目。例如,S 县 W 镇“红韵新生·旅居共创计划”凸显了地方特色文化与数字创意的有机融合。该项目组织 15 名数字游民围绕红色文化开展产品设计和空间改造,实现了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有效转化。二是构建“政府—游民—市场”三位一体的合作框架。其中,政府作为基础赋能者提供政策支持,数字游民作为创作者输出技术创意,市场作为联结者搭建转化渠道,从而降低项目整体风险。例如,安徽黟县政府出台《黟县支持数字游民共居共创政策 10 条》,设立三个“100 万元”资金支持数字游民招引、创业和投资。黟县还通过“揭榜挂帅”将产业需求分解为游民任务包,包括乡村旅游规划、农产品包装设计、文旅短视频创作等。三是完善利益分享机制。项目应突破“一次性交付”局限,建立多元价值转化链条。例如,W 镇项目形成“单次服务+销售分成+地方增值”的复合收益模式。安吉余村则通过“两人股三受益”机制(即村民以资源资产入股,拿租金、挣薪金、分股金)实现“原乡人”和“新乡人”的利益共生^[36]。2023 年,余村村集体收入 2247 万元,全村村民获分红超 300 万元。该转化体系展现了如何通过机制创新进一步动员内外部资源,从而降低数字游民经济资本转化难度。

(四)以符号资本积累为助力:构筑“知识型”能人形象

数字游民符号资本的积累过程,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和路径依赖性。随着文化、社会和经济资本的持续积累,符号资本得以逐步增加,进而形成资本积累的良性循环机制。然而,在 Cohere 社区这类初创社区中,符号资本的功能性价值尚未充分显现。相较而言,成熟数字游民社区以及乡村职业经理人、青年创客等其他入乡群体的实践经验为此提供了有益参考。

符号资本积累的核心在于构筑合法性来源。一方面,要充分“向上借力”构筑权威^[37]。数字游民作为一种外来的人力资源,与流入地政府的关系可以有更多拓展空间^[38]。数字游民和地方政府存在天然互补性:前者需要制度认可以获得“地方准入”,后者需要创新动能来激活区域经济。因此,两者容易达成经营意义上的初步合作。一些基层政府甚至会在打造“工作亮点”的政绩压力倒逼下大力营造支持性的乡村创业环境,为青年在乡生活、创业扫除各类障碍^[39]。例如,黟县碧阳镇专门设立“数字游民服务窗口”,累计解决网络适配、住宿协调等难题 40 余件;在安吉,“DNA 数字游民社区”为游民提供了免费的注册地址和办公空间。在此基础上,双方合作可以逐渐从生产领域扩展至文化传播、空间规划、基层治理等更多领域。其中,参与地方任职是入乡青年符号资本积累的有效途径之一。在社区运作的成熟阶段,政府可以邀请社区主理人、数字游民先锋等在地方政协、乡贤联合会、青年商会等机构中担任职务。另一方面,要充分“向外求和”寻求支持。数字游民需立足乡村发展现实需求,依托知识通过实效性贡献确立专业权威地位。数字游民可以充分发挥其在农产品包装设计、数字技能培训、建筑更新、景观优化、文化传承等方面的主体性作用,助力培育打卡经济、赛事经济、疗愈经济、节庆经济等新消费场景,从而深度参与乡村共居共建共创实践。例如, Cohere 社区数字游民团队通过对阿平小吃店的成功改造,有效提升了该店铺的经济效益,因此在当地老街商业圈引起了较大关注,其他店主也表达了改造意愿。除此之外,还可以充分利用大众媒体对成功案例进行宣传报道,帮助数字游民塑造“知识型”能人形象,进而提升其社会认可度。这一转化过程本质上是通过持续的价值输出与有效引导,逐步建构数字游民的专业权威和社会影响力。

五、结 语

数字游民作为新入乡青年群体,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动能。本文基于布尔迪厄实践理论中的“场域—资本—惯习”理论框架,通过对 Cohere 社区的田野观察和多主体深度访谈,系统揭示了数字游民在嵌入乡村场域过程中的资本转化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游民以文化资本转化为基础促进城乡经验融合、以社会资本转化为纽带推进在地互动、以经济资本转化为核心动员内外资源、以符号资本转化为助力建构“知识型”能人形象,逐步形成“多主体参与—多场域实践—多类型资本转化”的实践模式。然而,乡土规则难以适应、在地情感联结不深、内外资源动员乏力、制度性支持不足等方面的挑战仍然存在。要更好地实现数字游民的乡村嵌入,必须立足乡村发展实际,找准青年需求和乡村需要的结合点。只有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加强数字游民“乡村参与者”的身份认同,通过制度化设计打造互动场域、建构关系网络、集聚内外部资源、提升身份形象,才能充分发挥数字游民在促进乡村全面振兴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以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 Cohere 社区为观察对象,其低入驻门槛和较短运营周期的特性使得社区中数字游民的乡村参与度和稳定性存在一定局限性。未来研究可从以下方向深化:其一,拓展不同类型数字游民社区的对比研究;其二,开展纵向观察,挖掘资本转化机制的动态演变规律;其三,深入探究数字技术与传统乡村的融合路径。这些研究将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数字游民助力乡村振兴的潜在价值与实现路径。数字游民与乡村振兴的良性互动,既需要制度设计的创新突破,也需要文化认同的深层建构,其最终指向的是城乡融合背景下新型社会关系的重塑与再造。

参考文献:

- [1]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以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为动力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J]. 求是, 2025(5): 39-45.
- [2] 国家统计局.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况[EB/OL]. (2021-05-11)[2025-11-05]. https://www.stats.gov.cn/sj/xwfbh/fbhwd/202302/t20230203_1901080.html.
- [3] 国家统计局. 上半年国民经济迎难而上、稳中向好[EB/OL]. (2025-07-15)[2025-09-15].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507/t20250715_1960414.html.
- [4] 李海金. “外源内生”:乡村人才振兴的实现路径[J]. 人民论坛, 2023(17): 56-60.
- [5] 新华网. 我国各类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超过 1200 万人[EB/OL].

- (2025-02-24)[2025-09-15].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50224/7ffe96e5f3ec4b8cb815de0bb8f9ad2e/c.html>.
- [6] 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十四五”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发展规划》的通知:农人发〔2021〕9号[J].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报,2022(2):44-58.
- [7]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N]. 人民日报,2025-01-23(01).
- [8] Makimoto T, Manner D. Digital Nomad[M].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1997:3.
- [9] Pumble. Digital Nomad Statistics for 2024[EB/OL]. (2025-05-30)[2025-09-15]. <https://pumble.com/learn/digital-nomad-visa/statistics>.
- [10] 姚建华. 数字游民“热”的“冷”思考[J]. 人民论坛,2024(7):86-89.
- [11] 姚建华,杨涵庚. 西方数字游民研究述评与中国启示[J]. 中国青年研究,2023(11):81-89.
- [12] 李东航. 引导数字游民助力乡村全面振兴[J]. 人民论坛,2025(5):87-89.
- [13] 王云龙. 从“游走”到“入乡”:数字游民的乡村嵌入与重塑:基于浙江省A县的经验考察[J]. 中国青年研究,2024(6):68-77.
- [14] 李立杰,王珏,陈拓. 数字游民公社的乡村嵌入与乡村产业振兴:以安吉DNA数字游民公社为例[J]. 青少年研究与实践,2024,39(4):1-10.
- [15] 曾昕,沙垚. 虚拟与现实的居间地带:数字游牧青年的新型社会化实践[J]. 新闻与写作,2024(12):16-25.
- [16] 姚建华. 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中的数字游民研究[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4,61(2):126-129.
- [17] 布尔迪厄,华康德. 反思社会学导引[M]. 李猛,李康,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4-19.
- [18] 布尔迪厄. 实践理论大纲[M]. 高振华,李思宇,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213-238.
- [19] 许玉慧,吴嘉明,韩璐,等. 旅游绅士化进程中乡村生活空间重构及其机制:基于场域理论的解析[J]. 地理科学进展,2025,44(10):2109-2124.
- [20] 程波,李伯华,刘沛林,等. 传统村落数字化保护的逻辑:场域转换、样态演进与价值实现[J]. 地理研究,2025,44(2):434-449.
- [21] 张文娟,张菱珂. 未竟的身份:中国式数字游民身份的媒介化制造与协商:基于大理数字游民社群的田野考察[J]. 新闻与写作,2024(7):76-90.
- [22] 刘志军,杨程越. 返乡入乡青年人才的场域嵌入困境及其应对:对乡村职业经理人群体的研究[J]. 青年研究,2025(1):96-114.
- [23] 团浙江省委.“三式”共融凝心聚力 把浙江打造为各路青年人才梦想实现之地[J]. 中国共青团,2024(22):18-19.
- [24] 徐德骥. 学术生长点之辨:数字游牧研究的理论重估、方法检视与议题拓展[J]. 新闻与写作,2024(12):38-49.
- [25] 于水,区小兰. 从嵌入到共生:“城归”群体参与乡村振兴的探究[J]. 长白学刊,2023(5):122-130.
- [26] 姚建华,郭琦璠.“U盘式”情感连接:数字游民在地化社区中的媒介化交往实践[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25,32(1):38-53.
- [27] 阙明坤,许佳宾,李维. 身体离场与身份迷失:乡村振兴中青年人才身份重构及嵌入路径[J]. 社会科学家,2023(4):155-160.
- [28] 陈拓,李立杰,王珏. 从“游”到“民”:DNA数字游民公社的组织力量与乡村嵌入[J]. 传媒观察,2024(8):75-86.
- [29] 雷薇田. 独立自主:个体化理论视角下安吉数字游民的生活实践[J]. 青少年研究与实践,2024,39(4):11-20.
- [30] 王玉玲,施琪. 县域视野下青年返乡创业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2021(7):23-28.
- [31] 王炳钰. 中国数字游牧的生成、实践与维系:基于“流动基础设施”的视角[J]. 广东社会科学,2024(5):206-221.
- [32] NCC 共居共创社区. 2024年全景式数字游民洞察报告[EB/OL]. (2024-11-12)[2025-04-24]. https://news.sohu.com/a/825878293_121652971.
- [33] 霍婧仪,肖彦,臧佳明.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乡村数字游民社区发展策略:以浙江安吉溪龙村为例[C]//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美丽中国,共建共治共享:2024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24:242-250.
- [34] 陈立民. 打造“数字游民”向往的栖息地[N]. 新华日报,2024-09-27(3).
- [35] 厉以宁. 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M]. 修订版.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54-56.
- [36] 李丹丹. 青年与乡村双向奔赴共绘未来乡村新图景[J]. 浙江经济,2024(4):70-71.
- [37] 胡毅然,蔡璟浩. 再造乡村:乡村振兴中的异地创客与青年实践[J]. 中国青年研究,2025(1):102-110.
- [38] 姚立兴,郑维妙,但佳怡. 数字游民的典型特征、生成原因及引导策略:基于浙江的调查研究[J]. 青少年研究与实践,2024,39(4):21-30.
- [39] 毛一敬. 乡村振兴背景下青年返乡创业的基础、类型与功能[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1,20(1):122-130.

(责任编辑:陈婧)